

尊经重教以成“为治之具”

——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思想宗旨

蒋永福

摘要 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思想的价值取向是功能主义而非认知主义。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一直贯穿一根“红线”,就是以尊经重教为表现手段,以成为“为治之具”为旨归。文献分类活动中尊经重教的表现包括:以经为首,明道为要;经史子集的差序格局化;以义归类而非学科分类;会通理解,不求精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思想,对进一步挖掘古代图书馆和目录学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对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也有现实意义。表2。参考文献14。

关键词 文献分类 思想评述 中国古代

分类号 G257

Respecting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to Become the Dominant Tool: Ideological Purpose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Activities

Jiang Yongfu

ABSTRAC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functionalism rather than cognitivism, respecting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enabling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to become an effective learning and research tool. The system put priority on the literature of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focusing on understanding Taoism, use a distinctly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o organize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classifying liter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significance rather than subjects, focusing on comprehensive but not necessarily completely correct understanding.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further the exploring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in library science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2 tabs. 14 refs.

KEY WORDS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Thought review. Ancient China.

1 引言

众所周知,汉代刘歆所编《七略》首创新文献分类的“六分法”。南齐王俭撰修《七志》,首设经典志,次设诸子志,次设文翰志,次设军书志,次设阴阳志,次设技艺志,次设图谱志,后又附见道经、佛经。与《七略》相比,《七志》是名副其实

实的“七分法”(若加两个附录,则为“九分法”)。而南梁阮孝绪《七录》分内外篇,其中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为内篇,佛法录、仙道录为外篇,合计为七大类,是较典型的“七分法”。魏郑默作《中经》,开四部法先例,西晋荀勖借鉴《中经》的体例,编撰《中经新簿》,其分类体系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后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仍标甲乙丙丁,但把乙丙内容互

换(即子史二部互换位置),成为经史子集四部的顺序;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直命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由此“经史子集”四部之名形成;而清代乾隆朝所修《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则为彻底贯彻经史子集四分法的集大成者。可见,从六分到七分再到四分,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体系流变的主线^①。那么,这种流变的内在机理或推力是什么呢?本文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尊重教以成“为治之具”。下文将从五个方面予以考证。

2 以经为首,明道为要

维护经典的首要地位,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首要准则。这一准则无论是在官方的文献整理活动还是在私人的文献整理活动中都贯穿无遗,以至自《七略》起这一传统绵延传承两千多年,直到清王朝灭亡为止。以经为首在文献分类活动中的根本表现就是:把经类文献置于首位,而且把这种位置安排作为“永制”固定下来。经是什么?《白虎通义·论五经象五常》曰:“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宋代王阳明(字守仁,1472-1529)对“经”作了如下解释:“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①《汉书·艺文志》云:“六经者,圣人之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

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周予同先生对“经”作的通俗定义是:“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之称。”^②那么,什么样的文献/知识被列入经类呢?我们可通过《七略》、《七录》、《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经部内容窥其一斑(见表1)。

表1 经部内容一览

《七略》(六艺略)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②
《七录》(经典录)	易、尚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隋书·经籍志》(经部)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	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从表1看出,能够称经的知识主要为“先王之陈迹”(老子语)及其解释性知识,或者说,能够称经的知识主要为有关“道”方面的形上知识,而形下知识(器)决不可称经。庄子认为,道术为一、为源、为本,百家之学为流、为末。经学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经学载道、论道、传道,是所有知识的不竭之源,后世者只能通过经学才能体道、悟道,进而才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语·周语下》云:“何以经国,国无经,何以出

① 从六分到七分再到四分只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体系流变的总体表现过程,这一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特例,如李淑《邯郸书目》的八分,茅元仪《白华楼书目》的十分,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的十二分,孙楼《博雅堂藏书目录》的十七分,钱曾《读书敏求记》的四十六分等。但这些特例主要见于私家目录中,而官修目录基本表现为“从六分到七分再到四分”的演变过程。

② 《七略·六艺略》名为“六艺”但却列出了九类,即多出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之所以如此,清人王鸣盛(1722—1797)在《蛾术篇》卷一中解释道:“《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王国维在《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中也作了大体相同的解释,认为刘向、刘歆父子于五经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

令。”《韩诗外传》(卷五)云:“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另外,经书的首要地位还源于先人“文出于经”的观念。南宋陈骙在《文章精义》中认为,六经,《四书》“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议论,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这些认识,其实都提出了一个无形的问題: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答案就是:经学知识最有价值^①。这说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旨趣不在于文献秩序,而在于“明道”,即通过文献分类活动,把统治集团认可的“经义”(王道)凸显出来,使其法定化、常规化。对此,《总目》凡例十九则说得非常明确:“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

3 经史子集的差序格局化

上文论述了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中以经为首的原由,那么,经与其他三部(史子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经、史、子、集四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经史子集的整体结构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②。

差序格局的特点在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不平等关系,而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所依据的经、史、子、集四部之间正是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结构关系。关于经史子集的整体结构关系,台湾的杨家駱先生认为,经史子集的结构实际上体现了“根—干—枝”结构形式,即以经为“根”,以史和子为“干”,以集为“枝”。据此,黄庆萱先生指出,“在中国图书经史子集四分法中,史部根源是经部的《尚书》和《春秋》,是记忆

活动的记录,以求真为重点;子部根源是经部的《周易》、《周礼》、《仪礼》、《礼记》,是理智活动的结果,以求善为重点;集部根源是经部的《诗经》、《乐经》,是情感活动的产物,以求美为重点。”^[3]杨家駱和黄庆萱两先生的话,表明了经史子集系统是一个以经为中心并以与经距离远近、亲疏程度安排其它三部次序的差序格局。

对于经史子集的关系,乾隆皇帝也有一段精彩比喻:“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后水喻文,原溯其源。”^[4]乾隆皇帝的这段话,清晰地界定了“经→史→子→集”这种差序结构的内在逻辑。这种“经→史→子→集”的差序格局,其实就是中国古人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问题的明确回答。这说明,“斯宾塞问题”在中国古人那里早有定论,只不过中国古人认为“首重者经”而非科学知识。如果说,古代文献分类“以经为首,明道为要”是为了凸显王道的法定性和常规性,那么,经史子集差序格局化则是为了使王道内容的结构化、定型化;如果说,“以经为首,明道为要”是古代文献分类必须遵守的内在法则,那么,经史子集差序格局化则是古代文献分类必须遵守的外在结构法则。

4 以义归类而非学科分类

所谓“以义归类”(也叫“以意归类”)是指以文献的价值意义作为分类标准的归类方法。而学科分类则指以文献内容的学科属性作为分类标准的归类方法。学科分类遵守客观分类原则,即主要依据文献内容的学科归属来类分文献而不顾文献内容的价值意义。近现代图书分

①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 Spencer)在《教育论》一书中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后来学者们把这一问题称为“斯宾塞问题”。参见:斯宾塞.教育论[M].胡毅,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8,43。

② “差序格局”一词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并阐释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即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以个体为中心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

类法皆守学科分类准则,而中国古代文献分类则守以义归类准则。那么,这里的“义”具体指什么呢?清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互著》中的一段话点明了“义”的所指:“部次条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氏的意思是,“申明大道”乃为编撰目录“部次条别”的旨趣所在,即“以义归类”的“义”指的是“道”。因此,文献分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体“道”的过程。“道可道,非常道”。中国古人所说的“道”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因而不可论证和推理。所以,中国古代的文献分类并不以知识分类为鹄的,而是以申明文献所载的“道”为鹄的。再引章学诚《文史通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中的话来说,“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傅荣贤先生也指出,古代文献内涵之“道”并不全然显露于文献外表,而需经由识读主体的主观赋予,分类正是分类者作为识读主体而赋予文献之“道”以各种意义与价值的有效形式^{[3]149}。

从以义归类的角度看,由于“道”之义不能具体论证而只能体悟性地理解,因而在文献分类时,对于某一文献具体入哪一类,往往以分类主体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如明顾应祥《惜阴录》,在《明史·艺文志》中入儒家,而《总目·惜阴录》提要编撰者认为此书“颇及杂说,不专讲学”,故《总目》将其改入杂家类;清孙钟瑞《圣学大成》,《总目》提要编撰者认为书中“所引皆讲学之语,为列于儒家”,但由于“其中杨起元辈俨然自号比丘者,亦厕简牍,则其流不一矣,故改录之于杂家”。也就是说,由于杨起元的学术“变乱先儒,流毒及于经义”,因而影响到了《圣学大成》的“纯洁”,故《圣学大成》不能入儒家。对此,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指出:“后世著录之人,更无别出心裁,纷然以儒杂二家为蛇龙之范焉。凡于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归,爱之则附于儒,轻之则推于杂。”

当然,由于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各类书籍层出不穷,至清代书籍形制和内容的复杂多样,使得《总目》的编撰者已经无法一以贯之地按照以义归类的标准(辨义标准)来类分文献,而不得

不辅以“辨体”或“辨人”标准。《总目》史部的分类就以体裁作为主要分类标准。如同样是关于宋代历史的书籍,《宋史》入正史类,《续资治通鉴长编》入编年类,《宋史纪事本末》入纪事本末类,《钱塘遗事》入杂史类。对此杜定友指出:“史部之弊,在于以体裁为制,无复辨章学术之意。《四库》史部类十五,以正史为纲,以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为纪传之参考,以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为诸志之参考,以史评为论赞之参考,似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时令、地理、职官、政书而外,均以体分,于义无有。”^[5]杜先生的这段话确属慧眼之语。这就是说,史部分类标准是“辨体”而非“辨义”。

从非学科分类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显然“有科之名而无科之义”^[6]。如果以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反照经学诸门类而作简单分类,则《易》、《论语》、《孟子》、《孝经》等经书属于哲学类,《尚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属历史类,《诗经》属于文学类,《尔雅》属语言文字类。对此,杜定友先生在批评《总目》时尖锐地指出,“盖《提要》作者本无分类标准可言。儒、杂之分,在乎其人,而不在乎其学。褒之贬之,本无所据,惟以孔门弟子尊之为儒,以遂其尊圣卫道之念而已,所谓非客观之分类也。窃尝论之,儒为通学之称。儒者所研,必有一得,所谓道之一端是也。儒者所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今日之分科言之,则有属于哲学者矣,有属于心理学者矣,有属于政治者矣,有属于经济者矣。”^{[5]45}中国古代这种文史哲不分的“通学”特征,从思维方式上阻滞了以学科属性为分类标准的分类法在中国的形成,反而锁定了非学科分类的历史传统。这一点,傅斯年先生早有定论:“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7]

5 会通理解,不求精准

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求真理的方向发展^[8],且逐渐形成重广博而尊通识的学风,“博学”成为士人执意追求的境界,更

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钱穆指出：“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9]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中强调，治史者必须做到“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藉多闻，以成博识”。宋代郑樵在《上宰相书》中更是强调“会通”的重要性，他认为，“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这种追求“博学”、“会通”的学风或治学之道，固然有利于形成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但一味追求整体性的“会通”理解，难免牺牲局部或细部的准确性。中国古代文献分类就长期存在这种“重会通轻准确”的问题。具体言之，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不以文献分类是否科学作为着眼点，而是追求圆润融通的整体性特征，要求“因其变而观其通”，即追求融会贯通的全面，而不是分门别类的精确。这种忽视精确性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立类逻辑上，整体逻辑清楚而细部逻辑混乱。从被誉为我国古代目录学集大成者的《总目》立类逻辑看，它框定了“经→史→子→集”四部及其类序^①，从整体上贯彻了尊经、重史、轻子、鄙集的思想逻辑，显得整体逻辑很清楚。但是，从细部看，立类及其类序逻辑却显得混乱。这就形成了在会通、融贯的框架中出现局部或细部“异化”的局面。对此，杜定友在总结《总目》的“四部之弊”时指出四部立类不合理，“释、道分割而名、墨不列家，四书入经而孔门弟子夷于门外，史部不以时次而以体制，子部庞杂不成一家之言，集部诗文不分而出词曲，其卤莽灭裂，是非颠倒，不一而足”^{[5]24}。杜先生这段话是在批评《总目》的立类逻辑不清楚，而刘国钧先生则批评了《总目》细部类序的混乱，他说：“《四库》类目之大弊在于原理不明，分类根据不确定。既有道统之观念，复采义体之分别。循至凌乱杂沓，牵强附会。说理之书与词章并列，记载之书与立说同部。谓其将以辨章学术

则源流派别不分，谓其以体制类书，则体例相同者又多异部。谓其将以推崇圣道排斥异端，则释道之书犹在文集之前，岂谓文章之于圣教尚不如异端乎？”^[10]

二是类目涵义笼统而无限定，致使分类不统一、不准确。一个类目应收什么样的书，要依据类目名称本身的明确涵义或为该类收书范围所作的限定。然而，中国古代书目著作的类目体系往往只有经史子集及其子类的笼统类名，而很少有每一类应收何类主题书的具体限定说明。这就为分类主体会通理解而“随意”归类提供了方便条件，由此难免出现分类的不统一和不准确。如关于“小学”类的归类问题，《汉书·艺文志》认为，小学书可以“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故将小学列入经部，且其位置仅次于儒家经典；同时，《汉书·艺文志》又认为“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所以它的小学类只收《史籀》等十家专讲文字的书。明代藏书家陆深认为，“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医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其《江东藏书目》的第十二类为小学、医药类，出现了小学类书和医药类书混放于一处的奇特现象。而《总目》则把小学类书加以拆分，将讲幼仪的书入儒家类，讲笔法的书入杂艺类，讲蒙求的书入故事类，讲便于查阅记诵的书入人类书类，篆刻类书入子部的艺术类，同时对篆刻类书进行了会通理解，其云：“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元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又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由此可见，由于类目涵义过于笼统，致使分类主体的会通理解过于宽泛，甚至过于“随意”，进而导致分类的不统一、不准确。

三是类目数量过少，标引深度不足，专指度低。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最多限于三级类目^{[3]101}，而大部分限于二级类目（见表2，只统计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书目著作）。如果考虑经史子集一级类目不入书，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献分类实际上大都只限于一位类目。其中设类最多的也只有442个（郑樵的《通志·艺文

① 这里的“类序”非指“为类作序”之文，而是指“类目之间的顺序”之义。下同。

略》),最少的只有 38 个小类(《七略》)。如此少的类目数量以及如此浅的类目等级,必然导致很多书籍没有专指类目可归而只能“靠类标引”或勉强入某类,进而导致标引深度不足,归类不够恰准。这种情况之所以延续两千多年而不改变,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人一直不想突破四部“永制”(像郑樵和孙星衍那样立 12 大类者少之又少,故不可能改变四部永制局面),总想

以一驭万、以四部“一网打尽”的会通诠释传统,锁定了中国古人的分类思想路径。而不想或不能突破四部永制的根源在于不想改变尊经明道的分类要旨和经史子集差序格局的分类结构规则。也就是说,即使牺牲分类的精准度,也不能放弃对儒家核心概念(道、经、仁、义、礼等)的会通理解传统。

表 2 古代部分书目著作类目数量

书目著作名	类目数量	书目著作名	类目数量
《七略》	6 大类 38 小类	《直斋书录解题》	4 部 53 小类
《七录》	7 大类 55 小类	《通志·艺文略》	12 大类 82 小类 442 目
《隋书·经籍志》	4 部 6 大类 55 小类	《文献通考·经籍考》	4 部 55 小类
《群书四录》	4 部 42 小类	《澹生堂藏书目》	4 部 46 类 243 目
《古今书录》	4 部 45 小类	《孙氏祠堂藏书目》	12 大类 44 小类
《崇文总目》	4 部 45 小类	《四库全书总目》	4 部 43 类 66 目
《群斋读书志》	4 部 45 小类	——	——

6 赋予政教人伦意义,以实现“为治之具”的功能

中国古代对文献进行分类,其宗旨并不在于获得文献秩序,而在于显明文献背后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用道家语言说就是“道”,即文献分类的宗旨在于“明道”;用宋明理学的语言说就是“明理”,即文献分类的宗旨在于宣明“仁义礼智”为内容的“天理”;而对处于社会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来说,则是为了“治民”和“治国”。也就是说,文献分类的意义在于通过树立经典、经学至高无上的地位来教化民众,以期达到“治民”和“治国”的目的。所以,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的宗旨最终落在伦理教化、整饬思想秩序的功能上。

《汉书·儒林传》云:“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隋书·经籍志》中的一段话更是直接点明了文献分类的为治之具功能,“夫经籍也者,机神之

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黻黼,皆为治之具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孔子校订六经也是以文献的政教人伦价值为标准的。《史记·孔子世家》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皇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又如《礼记·经解》假孔子之口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再如《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语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文献分类何以成为为治之具?或者说,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是通过什么方法或途径发挥为治之具功能的呢?笔者认为,是通过赋予文献以特定意义即政教伦理意义的过程而实现的。

这种“赋义”过程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实现：

(1)通过著录、存目、烬毁之别来划定文献价值的高低

中国古代的官修目录并不是把所能收集到的文献都予以翔实著录，而是根据文献所具有的政教人伦价值的大小予以分别处理。在这方面，《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纂修过程表现得尤为突出。

《总目》凡例第十七则明确指出了著录原则：“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乾隆帝对此十分重视，他数次降旨明确指出，“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抄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词意抵触本朝者当在销毁之例”，“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有俚浅伪谬者止存书名”。而从最后成书的《总目》看，所处理的文献主要分为著录、存目、烬毁三类。

《总目》所著录并刊刻的文献自然属于那些被编撰者认为符合当朝政教人伦价值取向的“应刊”文献，共著录了3,461部。而那些被认为是“言非立训，义或违经”或者是“寻常著述，未越群流”的文献则只为其“存目”，共存目6,793部，比著录文献数量还多。如李贽的《藏书》和《续藏书》就被《总目》编撰者批评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故只能打入存目类。最令人痛心的当属被烬毁的文献。据统计，当时仅浙江一省毁书538种，13,862部之多。对此，顾颉刚先生说：“以故网罗虽富，而珍闻秘笈横遭屏斥者乃难悉数。惟其寓禁于征，故铜钲摧残靡所不至其沦为灰烬者又不知其几千万卷也。”^[11]鲁迅先生也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12]王重民先生于1958年著文指出，《总目》提要的“思想内容集中在宣传封建思想和消灭民族思想的两个方面”^[13]。

(2)通过类序安排来界定文献之间的意义大小

中国古代文献分类，在类目次序的安排上普遍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意义和功能大的类名（或文献）排在意义和功能小的类名（或文献）

之前，意义和功能相同或相近的类名（或文献）靠得较近。这种安排体现了一种规律性：文献按照其内涵的意义和功能递减序列排序^{[3]110}。当然，这里的“意义和功能”，指的是政教人伦意义和功能。

如在《七略》中，六艺之学和诸子之学被认为是“大道”之所存，故排列于前；而算术、方技之学则被认为是形而下之“艺学”，故排列于后。这完全符合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的逻辑，即“道”才是最重要的，而算术、方技等技艺只能“游”于其中，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更加凸显“道”的至高无上性。单从算术略来看，从天文到历谱，从五行、卜筮到形法，其次序是从天到地下，先天文而后地理，构成了前后有序、高低有分的知识价值序列。对此，杜定友评价说：“夫古之学术有道器之分，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诸子之学，所谓道者也，为无形之学；术数方技，所谓器者也。虚礼实事，义不通科。”^{[5]44}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思想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经学为上、技艺为下的道器二元分离轴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知识不受重视的思想根源。

(3)通过编撰“序”的方法说明每一类文献的意义及其次第

中国古代的一些书目著作有为类目作“序”的体例安排。置于部类者，谓之“总序”或“部序”，置于小类者，谓之“序”，统称“小序”。《总目》卷首凡例云：“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余嘉锡说，“小序之体，所以辨章学术之得失也”^[14]。这种“序”文为编撰者发挥主观“赋义”能事提供了有效空间。这一点，可从“小说家”作品的“遭遇”得到证明。在中国古代，一直有鄙视“小说家”的倾向，所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造”是也。刘向、班固则干脆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把小说家排除于可观者之列。然而，《七略》、《七录》、《七志》、《隋书·经籍志》、《总目》等均把小说家列于诸子之列，其原因在于人们看到了小说作品的教化意义和社会功用。如凌元翰《剪刀

新话序》云：“是编虽裨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辅于世。”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溧阳消夏录·小序》云：“小说裨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在这里，凌元翰和纪昀以作“序”的方式赋予小说家作品以“劝善惩恶”的教化意义。

“序”之详述，还是要首推《总目》。其总撰官纪昀在子部总序中详细阐述了子部各类的排序逻辑：“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医焉。神农、皇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歧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难言也，归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裨官所述，其事未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奕，故次以现实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这里，纪昀共用了十二个“次以”说明了子部各家文献的意义递减次序，足见其用心良苦。在《总目》的各类“序”中，几乎都说明了这种意义次第。在上引子部“序”言中，从“儒家尚矣”到最后“释家、道家终焉”，实际上就是对各家文献之政教伦理价值递减次序的界定。

7 结语

清人章学诚把目录分类的要旨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氏的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它没有指明辨考的目的所在。笔者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只是手段，而目的在于使目录分类具有“为治之具”的功能。由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思想的价值取向

是功能主义的，而不是认知主义的。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法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西方文献分类法的根本区别所在。在功能主义价值取向向下，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思想一直贯穿着“手段服务于目的”的演进路向。据此，本文所论五个方面可作如下概括：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思想，在“为治之具”之教化功能目标的限定下，形成了四个方面的手段方法——以经为首，明道为要；经史子集的差序格局化；以义归类而非学科分类；会通理解，不求精准。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法及其思想传统，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它留给我们的思想启迪是永恒的。研究它对我们更好地梳理中国古代图书馆思想史、目录思想史、分类思想史，仍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价值，尤其对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梁启超语）思想理论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此亦为本文的立意所在。

参考文献：

- [1]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上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254-255. (Wang Yangming. Complete Works of Wang Yangming (Volume 1) [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92: 254-255.)
- [2] 周予同.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844. (Zhou Yutong. Zhou Yutong's Selected Works of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96: 844.)
- [3] 傅荣贤.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研究[M]. 台北: 学生书局, 1999: 序 II-III. (Fu Rongxian. Study of Books Taxonomy in Ancient China [M]. Taipei: Sudents' Press, 1999: Preface II-III.)
- [4] 弘历. 文渊阁记[G]//李希泌, 张淑华. 中国历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7. (Qian Long. Notes of pavilion of literary source [G]//Li Xibi, Zhang Shuhua. Chinese Books Collection i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odern Library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May fourth period). Beijing: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1982:

17.)
- [5] 杜定友. 校雠新义(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30: 40 - 41. (Du Dingyou. New Ideas about Collation(Volume 1) [M]. Beijing: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1930: 40 - 41.)
- [6] 陈黻宸. 陈黻宸集(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675. (Chen Fuchen.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Fuchen(Volume 2) [M]. Beijing: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1995: 675.)
- [7] 傅斯年.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G]//傅斯年全集(第6册).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80: 22. (Fu Sinian. Several problems in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G] // Complete Works of Fu Sinian(Volume 6). Taipei: Linking Books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22.)
- [8] 谭嗣同. 报贝元徵[G]//蔡尚思, 方行. 谭嗣同全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17. (Tan Sitong. Bao bei yuan hui[G] // Cai Shangsi, Fang Xing. Complete Works of Tan Sitong. Beijing: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1981: 217.)
- [9] 钱穆. 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M]. 台北: 学生书局, 1976: 4. (Qian Mu. Chinese Academic Annotation·Introduc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M]. Taipei: Students' Press, 1976: 4.)
- [10] 刘国钧. 四库分类法之研究[G]//刘国钧.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19 - 32. (Liu Guojun. A study on classification of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divisions[G] // Liu Guojun. Liu Guojun's Selected Works of Library Science. Beijing: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1983: 19 - 32.)
- [11] 郭伯恭. 四库全书纂修考[M]. 上海: 上海书店, 1937: 1. (Guo Bogong. Research on Compilation of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Divisions [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1937: 1.)
- [12] 鲁迅.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G]//鲁迅全集(第六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46. (Lu Xun. Essays written in a concession pavilion·the rest of tittle-tattle after the illness [G] //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Volume 6).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146.)
- [13] 王重民. 论《四库全书总目》[G]//李万健, 赖茂生. 目录学论文选.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330 - 353. (Wang Zhongmin. Research on general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Divisions[G] // Li Wanjian, Lai Maosheng. Selection of Bibliography. Beijing: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1985: 330 - 353.)
- [14]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56. (Yu Jiaxi. Textual Research on Bibliography[M]. Changsha: Changsha: Yue Lu Publishing House, 2009: 56.)
-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邮编: 150080。
- (收稿日期: 2011-05-14)